

命运、记忆与小说信念：法语俄侨作家维克托·塞尔日见证文学的世界意义

张 艺¹ 严志军² 李葆嘉³

1.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

2. 南京师范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南京；

3.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哈尔滨

摘 要 | 倾向艺术和文学的真实性的遴选早在 2001 年瑞典学院就高度认可华裔文学的真实原则，把百年大庆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籍作家高行健。先生在瑞典学术研讨会上以“文学的见证——对真实的追求”为题目发表演说，揭开了见证文学与文学见证接受的大幕。不接受艺术和文学的真实的倾向叫做自欺心理的文学。2017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石黑一雄的第一部小说《远山淡影》就被专家解读为关于日本侨民“自欺”心理的见证。瑞典方面坚持，还原历史，追求真实，叩问真理是见证文学最突出的特点。文学的规约必须正确解读为见证文学的作者必须是一位守护社会公众知识分子良心的观察者和记录者。误研和误判如果是平庸的恶，必须严肃纪律开除资格；误解和误会如果是人性的陌生，自然要进入谅解备忘录（美国人权组织的介入）的流程。被誉为“公众知识分子的良心”的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抢先俄裔见证文学大师维克托·塞尔日的研究者很长一段时间，迅速对塞尔日的见证小说作出了积极的，热情的反应。桑塔格撰写文章“不灭：为维克托·塞尔日辩护”，为这位被“双重遗忘于”

基金项目：论文为国家社科青年课题“苏珊·桑塔格疾病叙事研究”的系列成果，以论文为导向的系列研究决定把《中国符号学研究》更名为《新绿灯社刊物》和《国际化政论论坛》，期刊调研认识到《俄罗斯文艺》对于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正像是一只报春的燕子”，从仰望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到文学的引证见证俄罗斯文艺窗口的世界瞭望台意义，我们给《俄罗斯文艺》出来“支招”把符号学栏目改名为艺术神经学栏目，家父截至今天所有的绘画作品拍卖筹集的善款和笔者义演俄罗斯芭蕾舞的门票收入用来给栏目评审的专家科研酬金，给作者高额的稿酬，同时缅怀巴黎俄侨文学团体“绿灯社”的“自由与希望”的初心。

通讯作者：张艺，南京理工大学，讲师。E-mail: yizhangvicky0305@126.com。

文章引用：张艺，严志军，李葆嘉. 命运、记忆与小说信念：法语俄侨作家维克托·塞尔日见证文学的世界意义[J]. 社会科学进展, 2021, 3(1): 4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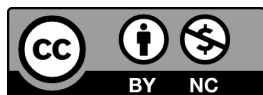
<https://doi.org/10.35534/pss.0301003>

俄罗斯现代文学和法国现代文学的信仰世界主义的作家的生命写作的见证小说作出了最具人道主义精神的辩护。桑塔格以“不灭”为题眼，守护大众文学的意义，守护阅读方式的升级。通过研读这篇文章，我们不仅又结识了一位俄罗斯的侨民作家，在语言的联盟中身同感受他们对祖国的不灭的真爱；聆听到他们的文学信仰和文学成就，在追求真实与推崇真实的文学风气不朽；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他们寻求接触，渴求对话的交往和写作里，感悟到文学的魅力也可以是在真实原则，在克制一己之身的不尽如人意，在悲悯和“同情的理解”（移情）“他者”/“她者”的“不幸”。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在道德，意义，原则与水平，以核心价值观为命运契约的认识的变化难以磨灭对真理价值观的保守。对记忆的窃取意欲灭掉建基真实价值观的真实命运，这样的诡计叙述，在第一时间内就应该作出不仅是不接受而且是消灭的政策。其原因是虚构在于文学的位置在世界文学上该有一席之地，虚构在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规划不仅是平庸的恶，不仅是唯我的恶，更是为推卸恶毒导致更严重的毁灭人类智慧共同体的恶行。水平的不足不应该成为自欺的虚构叙述，倡议因为水平的不足的种种问题应该在学习中解决，厌学作恶的现象如果出现在党派文学中必须及时取缔，流毒不再贻害社会和后辈。我们在这里提出纲领性的宣言，和谐社会核心价值观从此可以改为真实和真诚。在这里，谨以纲领的内部讲义与汉斯的社会意识共同体的设计作出对话，为何在习近平这一届的“命运共同体”的“一带一路”的虚构文学叙述和演示的始末严厉地违反党纪的“求是”原则。为何在因为夫人文学命运共同体的文学失落的心理下错误地走上危害党的历史的虚构色情文学。对外国经典文学的研讨和收获是严明我党纪律增添党员智慧的一堂党课。

关键词 | 苏珊·桑塔格 维克托·塞尔日 命运 记忆 真理探索 小说信念 共同体 世界意义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我的中国梦的合伙人泰国曼谷吞武里大学伯格理中文学院—昆明伯格理国际学校的校长汉斯的与美国合作的学校的背景墙上校长亲手镌刻着这样一番警世恒言：

我是一个集中营的幸存者。我亲眼看到人们不应该见到的悲剧：毒气室由

学有专长的工程师建造；妇女由学识渊博的医生毒死；儿童是由训练有素的护士杀害。所以，我怀疑教育的意义。我对你们唯一的请求是：请回到教育的根本，帮助学生成为具有人性的人。你们的努力不应该造就学识渊博的怪物，或者是多才多艺的变态狂，或受过高等教育的屠夫，我始终相信，只有孩子具有人性的情况下，读书写字算术的能力才有价值。

——德国吉诺特校长

斯得哥尔摩书鸿来往，传来呼应：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就把荣誉授予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艾利·威塞尔，艾利的获奖演讲告诉我们：“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十四行诗，我们的时代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见证文学^[1]（9）”。“我们的时代”“创造”的这种“新的文体”——“见证文学”也是2013年耶路撒冷文学奖荣获者苏珊·桑塔格在随笔名文“不灭：为维克托·塞尔日辩护”伊始叩问的“如何解释二十世纪最迷人的伦理英雄和文学英雄之一的维克托·塞尔日的默默无闻？如何说明《图拉耶夫同志的案件》所受的忽略？”^[2]（57）的答案所在。桑塔格通过随笔与演讲散播的民主、自由、文明的信念是对社会价值多元化与改良变革的文学护照，是对以“国际文学共和国”^[2]（155）取代宗教歧视与政治对抗的先声。虽然如桑塔格所说的“讲出真相并不会促进正义”^[2]（155），但是见证小说的信念教导我们，“以倾斜的方式讲出真理”，那就是宗教和平的底线是宗教的和谐。去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应许的谎言与行政的谎言不仅不在传递普遍价值的伟大理想，还在散播社会发展的云蒸霞蔚的幻景。作家的职责就是“使人们不轻易听信于精神抢掠者”^[2]（155）和肉体惩罚者。不在场的时间的压制激起见证文学无与伦比的发展，桑塔格慷慨激扬地论辩，“塞尔日那些小说，主要都是被誉为见证；激辩；充满灵感的新闻主义；小说化的历史。一个其主要著作不是文学作品的作家的文学成就，是很容易被低估的。”^[2]（61）新闻为中心的写作的成就果真如桑塔格说的，是很容易被低估的吗？见证文学就不能算得上文学作品？检索中国知网发现“伪证：见证叙事的伦理问题”的作者陈全黎认同桑塔格的观点，他相信，“从某种意义上说，见证文学不能称为现

代意义上的‘文学’；它更接近‘文学’的最初含义：文献。与狭义的‘审美’文学不同，见证文学可以作为一手史料（口述与文献）或证据。”^[3]（154）陈全黎老师说的有道理，在文学的“人道主义”的维度上，笔者宁愿相信，作为“对真实的追求”的“见证文学”，“毕竟是自由精神的庇护所，也是个人的尊严最后的防线。”^[4]（13）在这一意义上，“见证文学”不仅应该被视为文学作品，而且应该被视为是超越了形式藩篱的带有人道主义光辉的文学经典。有一个文学观念我们想在这里彻底打破，见证文学是文学作品，是新闻文学，与媒介文学不同，是记录真实文学事件的证据的传记文学，原则是绝对的非虚构。

2015年瑞典皇家文学院通过奖励的形式认可了白俄罗斯的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美联社在新闻播报方面犯了一个文学错误，说这是诺奖首次颁给记者。统计表明，创始于19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一个多世纪以来至少16次颁给有记者经历或有记者经验的作家。虽然有记者经历的作家与记者—作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无论是作家的多栖创作还是纸媒作家的转型，他们的身影与声音进入到瑞典时间的官方认可，2015年真的不是一个例外。瑞典方面把这个白俄罗斯女人称为“纪实作家”而不是新闻作家，笔者认为这一界定是贴切的，因为她在用复调式的写作纪念时代的苦难与勇气，堪称一座文学丰碑。获奖辞也是贴切的。俄罗斯人亲近巴赫金的“复调”与“多声部”这本来就是记录多元声音的理论支撑，而见证文学往往要求作者超越自身的个人主义面向悲悯的世界主义。这位出生于乌克兰毕业于新闻系的科班出身的新闻从业者她的独立新闻活动一度受到政府限制，她的批判良心与文学道德是与苏珊·桑塔格一样热忱的女人。如果说伍尔夫是小说化地关注二战，阿列克西耶维奇是介于法国见证文学与俄罗斯文学纪实传统之间的人类灾难回忆与见证文学的践行者。

诺奖一直以来有倾向记者身份作家的介入现实历史：

1938年的美国得主赛珍珠是笔者家国文学叙事历史的明星作家。她的传教士父亲的影响与她经提携担任《亚洲》杂志编辑与旨在沟通中西方文化的“东西方协会”主席。她能讲汉语，可以接受美国之音、英国BBC电台的邀请用汉语广播向美国介绍如何理解启蒙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1938年诺奖颁发

给她表彰的是她的文学视角的介绍与新闻讲话的沟通，赛珍珠的声音代表中国文化软实力，她的声音是柔软坚定的。

1953年的英国得主温斯顿·丘吉尔不仅应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而且应该颁发给他和平奖。这位首相在传记方面的造诣用于捍卫人道主义的崇高价值的演讲与他进入政坛前战地记者的经历相关。军校毕业，中尉记者，驻印作家，采访英国军事行动的稿件变成了纪实文学作品。离开印度到达南非，虽然身为随军记者他以携带武器英勇参战被俘，越狱成功后的他书写了回忆录名声大噪。他从英语民族史与英属殖民地的现实状况的实地经历促进了民族的和平。

1954年的美国得主海明威是国内普通读者比较熟悉的记者—作家，他的《老人与海》的写出与他曾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在西班牙内战前线为其他民族的解放事业的奋斗相关。他还曾作为记者随军参加了解放巴黎的战斗。他的举世闻名的“重压下的优雅”（*grace under pressure*）的文体风格毕业于军事新闻的严格训练。没有了海明威的时代太阳照样升起，但是一代又一代的战地记者从他的海上老人的意志磨砺自己的解放决心。

1957年的法国得主阿加尔·加缪与后来居上的“存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萨特一样热爱巴黎，前者应用自己提出的“荒诞哲学”到小说创作。加缪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从事《巴黎晚报》工作与活跃于抵抗运动的主编地下刊物《战斗报》的解放事业赋予他“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当时时代人类的良心”。

1962年的美国得主约翰·斯坦贝克在纽约《新闻日报》阵地赴南越的记者职业垮掉了他的身体没有垮掉他的现实主义的精神。他是从对记者职业的失望转向文学创作的。他比同时代的作家介入现实的行为都更实践主义。诺奖界内看重的是他的“同情的幽默”，尽管拥有这一素质的对记者失望的作家不乏其人。

1964年的让-保罗·萨特的获奖是诺奖历史上真正的大事。这位法国哲学家获得文学奖最走进了哲学国王的视野。萨特与新闻的渊源在自己创建的支持学生运动的解放事业。他与精神伴侣波伏娃的左派报纸出版事业对当时时代的影响决定了他成为一名新闻先锋作家的荣誉，尽管他认为哲学与文学应当保持距离拒绝领奖。

1965年的俄罗斯肖洛霍夫是二十世纪苏联而不是俄罗斯文学的杰出代表，

他的《静静的顿河》以史诗般的艺术热忱呈现了民族生活的“历史层面”。他的成功要归功于17岁就开始在《青少年真理报》发表小品文的努力。诺奖又一次违反了自己政治中立的原则忽略了他1931年起担任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刊物《十月》杂志编委卫国战争期间担任《真理报》军事记者的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原因是褒奖他的对真理探索的执著。

1976年的美国得主索尔·贝娄作为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犹太家庭的继福克纳和海明威之后最重要的美国小说家，他的得奖在于在美国的记者经历却继承了欧洲的现实主义的某些文学传统，创新了美国现代主义的一些观念和手法。

1978年的美国得主艾萨克·巴什维茨·辛格也是个犹太人出生波兰华沙。犹太人是从事新闻事业的传统的。当年诺奖对他的认可是他既扎根于波兰人的文化传统，又擅长现代的激情的叙事艺术，而且反映出了人类的普遍处境。对他的评语中规中矩。应该注意到他对犹太知识传统既背逆又认同的矛盾的奋斗历程，他受到哥哥影响违背父命走进了波兰犹太人文学界，在德国占领华沙前移民美国进入《犹太每日前进日报》用本民族的意第绪语从事报社写作。诺奖对他的青睐，与一种庄园犹太叙述传统的倾向相关。

1982年的哥伦比亚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奖再一次证明了瑞典方面偏爱魔幻文学。他与《百年孤独》的作者同为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作家。与其他魔幻作家与剧作家不同他是个社会活动家。正因为他的魔幻乌托邦的理念与实践的丰富性决定了他的历史小说的篇幅与结构的复杂。他与新闻的交道是一场逃离与转换战场：因连载文章揭露被政府美化了的海滩被迫离乡去国，祖国政府不依不饶查封了他客居他乡的《观察家报》的从业，他摇身一变到了古巴通讯社创作小说。马尔克斯还与古巴革命胜利攀上了关系。我们并没有绰号他文学变色龙的意思，必须要承认从理念介入的新闻写作不一定政治正确，飞散的去中心主义的戏说新闻也可以是一个文学方向。

1984年的捷克得主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获奖主因是《红色权力报》《平等报》的革命诗人事业的动力。他又一次将解放的人类事业与诗歌和新闻的生涯联系在一起，在国家叙事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平台上为社会的进步与个人的解放作出

了诗意形象的提供。瑞典接受了他的意识形态性还是看在他对解放的呼吁。与其评价他是记者作家不如尊敬他为解放诗人作家。

1998年的葡萄牙得主主若泽·萨拉马戈出生证明上的姓氏被登记成了“萨拉马戈”，意思是“野萝卜”。他的写作如同他的姓是一个野萝卜。以翻译和专栏作者跻身报界，在欧洲左翼知识分子大量退党时萨拉马戈加入葡萄牙共产党，在葡萄牙爆发了不流血的康乃馨革命时他几乎将《新闻日报》改造为葡共机关报，联合政府宣告垮台时萨拉马戈以新秀的姿态登上文坛。他热衷的作品是《修道院纪事》，甚至关注葡萄牙皇后的晚婚页。《罪恶的大地》为作家带来了戏剧化的声誉。

2002年的匈牙利得主泰斯·伊姆雷获奖的优势是语言与自传体风格，他的《火花》报社最初的记者生涯为自由撰稿人的写作方向奠定了基础。如果不是他将深刻刻画的心理分析分析与自我叙述的多重视角结合起来的文学语调，我们未必听到作家的声音。

2010年的秘鲁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之所以获奖是“对权力结构进行了细致的描绘”，他有便利这样写作因为他的职业跨度是从记者到总统候选人。曾在拉美最古老的学府进修文学与法律的学历使得他的揭幕文学来得更典雅，但是他选择了移居巴黎很早就为自己的新闻小说预定了“轰动”“禁书”的效果。他的代表作有《谁是杀人犯？》《酒吧长谈》。

长远的历史清单应该看到这个阿列克西维奇不是“首位”。争论她的作品是报告文学还是文献文学的问题意义大不过她的特稿写作的方式是否超越了纪实文学与采访文学具有了见证文学的模式创新。记者出身擅长寻找有价值的故事，但是如何将作家的观察身份与新闻工作者的批判精神结合变为一个探索型作家，她选择了不离开俄语的自我流放，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使得她的作品得到了传播。今年诺奖眼光投向诗歌文集，虽说晚于记者文学传统，但是迟来总比不来好，藏身媒介之外与跨越媒介的诗歌/歌诗创作与见证文学的艺术“和谐”终归是一个时代的问题，需要以时代的眼光扫描纪实与虚构的融合度。樱花依旧灿烂，文学创作就像一个轮回，从起点回到了终点。交替出现的各种文学流派其实都是愈久弥新的老陈货。不同的餐饮烹饪方式决定了她的不同的滋味与

口感。一流的艺术家人不是抛弃过去，说明了才华的胆怯。一流的艺术家是历史的忠诚者，她和谐于历史的存在而创新不止。“早到”与“晚来”的登场普惠与独特哪里有什么二元对立，明明是坚守家国理想的人更有个性魅力，可持续发展文明的人同时就惠恩了人类。凡是存了对立而不是和谐的观点与行为的人都是把自己所谓的文学成就凌驾于对他人的尊重与幸福的误解之上的野蛮。如果这种野蛮是野性与野外，那么身为一个国王或者一个男作家的价值观取向（心灵与肉体的）被她人威胁与挟裹，不仅不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英雄，而且不能称得上是一个以理性为精英主义标杆的成功人士。没有理性哪来激情。不经过理性的考验哪里有真爱的甘泉？如果说发疯去伤害就是疯狂文学的特色，每一个人走上街头都要带着防身的利器因为伤人的意图是任意的。没有了安全没有了稳定的社会从何谈起美丽幸福与理想？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文学天才与绘画天才有一些的确是疯子，但是他们的左轮手枪对准的是自己的脑门，这是献身艺术。伪装的艺术疯子将灾难的手枪指向人类再把责任推向艺术，弥赛亚的宗教暴力革命也不是这样的历史。更何况宗教和平和谐是我们的初心与初衷。我们从见证文学的角度强烈谴责始作俑者的历史承担，反思文化的激进主义，希望这样民主公义的新闻文学早日进入主流视野得到官方认可。世界上有太多的侧影与声音，但是真理的声音是不能被遮蔽与扭曲的，个人的忍让为的是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个人的幸福与促进人类的和平进步是和谐的。一个家国的情结一个国家的政治走了什么样的路线究竟被吹起了什么风？贤良淑德如果不是一个家庭主妇的必须也必须是一个国家的希望。贤良淑德如果不是服务于民族事业的继往开来，断代折腾式的发展害了别人苦了自己。如果一个女学者爱好者不能领会文学首先是人学是对人性的负责任的承担，一心一意认为艺术家就可以肆意妄为引起人类灾难生态文明灾难因为艺术的事业只能是大胆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艺术的事业是多元的是应该以和谐为第一要义。色情从来都是人类解放事业的驱动力，这一点国际作家从不否认更不回避，我们是促进的；但是，色情的标新立异与打压他人/她人的“存在就是合理的”不应该乱起冲突。如果说色情的行为艺术一定要挟裹观众认同，那就应该为观众的安全负责任到底。怎么能利用完观众的同情心与好奇心再摇身一变将灾难推给见证者呢？我们呼吁来年

的诺奖与和平奖思念一下文学道德承担的话题！

对“见证文学”在文学殿堂排序的思量，使得我们对另一个与“见证文学”相关联的问题启动思考——“见证文学”的内涵。引用国内学者在介绍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时所下的定义，“所谓见证文学，意思就是文学能够起到为历史见证的作用，作家应该记录自己个人在历史中的深切和真实的感受，用自己的语言去对抗以意识形态来叙述的历史和政治谎言，也就是给凯尔泰斯的颁奖词清楚地说明的，‘支持个人脆弱的经验而反对历史的野蛮专横。’”^[5]（81）我们大可不必纠结于不同的历史语境、不同的意识形态下，见证文学的内涵是否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关于“见证文学”我们早已熟悉类型、表征和意义的深入的变革。读书偶遇，笔者给同行介绍一位世界见证文学历史上迟到的杰出文学家——法语俄侨作家维克托·塞尔日。仿佛是再次验证着赛珍珠说过的，“作家应该成为一座沟通东西文明的人桥”；这位如今在世界文学史上因为追封占有一席之地之地的维克托·塞尔日，被“摆渡”进入中国读者与研究者的视野，最不遗余力为其文学“不灭”呐喊的水手，竟然是一位波兰裔的美国作家。在桑塔格眼中“不灭”的是精神，是价值，是信仰。

这位擅长对灾难文学，摄影见证和文学的“道德力量”迅速作出反应的“西方最智慧的女人之一”的美国军旅女作家，以非常罕见的“辩护”字眼，不仅定下了作为维克托·塞尔日的“同路人”和“知音”在写这篇随笔文章时的心态和调门；同时亦反映出一贯天赋将自己的内心“风景”投射到为他人画精神肖像，为他人作传借题发挥心景的她，为何要邀请“默默无闻”的维克托·塞尔日担当自己心景的见证？这一见证文学作家与作家见证文学相互发现的文学事件，对“祸福难料”（张慧君）的“普通读者”的我们，“带来了”（张慧君）哪些心灵的洗礼和道德的劝诫？苏珊·桑塔格称维克托·塞尔日的文学为“历史小说”，“政治小说”，“治疗小说”，“见证小说”，她对塞尔日指出的“小说家的真实性不同于历史学家的真实性”^[2]（83）作出了十分精彩的论述，小说家的真实性也可以是日常生活的艺术的真实性。辩证逻辑不是事物内部统一的必然规律，是外部相异的离心力的运作的指示规律，这样的故意曲解政治权威的诡计应该很容易辨别，以应许来生的名义左右命运是十分可笑的：

今生都应许不了，何来来生的把握？！以见证文学为借口的在场文学，她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假设女主人公的不幸需要经过女性配角的魔法的帮助，而忽略女性主角自身倾向探险与挑战的人格魅力。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女性配角柔性姿态却一意孤行地设计性爱应该是什么样的表现，比如说应该是抛弃前程，不计收获，甚至视性命为必得牺牲，因为文化进步的升级的女性必得要患上厌性症，或者她的性会变为倾向身份与意识而不是在宗教与性的魅惑的时空自主探索的激情。配角“主导”不仅怀疑女性主角的美丽与魅力，还不断地提出女性主角性天赋的欠缺与经过教育培养的性能力的虚假。再有就是女配角会从外国性的印度性的极端的要求审视“极端文化”的研究者，因为她能代表印度性从而充当“性比赛”的吹着黑哨的裁判。因为不会“从事”世界杯足球赛的音乐创作，所以“退下来”“代表”裁判来仲裁以性为中心的比赛是天经地义的，或者是体现着悲悯情怀的。这些吹黑哨的不公正的违法的行为在专业的人员眼中是极其站不住脚的，她质疑人类知识，抹杀人类智慧，更不值得忆念的是她严重地伤害着“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可爱的纯粹。这样的“人物”出现在古西班牙的法庭文学史的悖逆，也出现在“新时代”对历史的悖逆推出的对新闻性原则的悖逆。新闻事业的准则是真实性，时效性与艺术性，新时代我们应该加上“对话性”，更能服务于民主的信念。这是中国的新闻事业的最高准则，美国的在华的新闻事业我们还强调一个“价值性”与“政治正确性”。只要是与美方的记者和媒体打交道，我们一定要尊重对方的价值观和政治正确的底线，同时我们也应该树立和完善中方的价值观和政治正确的传播。在伊斯兰教世界的新闻交流与国际合作事业中，我们提出的原则与外交基本原则类似，以“求同存异”为基本原则，具体阐释是平等基础上的对话，特色与革新辩证统一。在印度的国际交流事业中，我们充分敬仰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外交原则的智慧，提出变通的巩固的智慧外交。在斯得哥尔摩的国际合作事业中，外交的原则是文化优先的意识外交，实现在新闻性原则是绝对的开放性，是绝对的国家主体地位的自身实验性的开放性，我们时刻保持信息与咨询的交通的迅速。在法国的国际交流发展观念的事业与生活中，我们绝对地坚守身体的美丽维度的科研与芭蕾舞艺术的发展与创造。在埃及的记事文学的志愿者的考察

中，我们的秘密是违逆真实原则的诡计的志愿者的肉体和精神 的消灭与埃及的王权文学的行在地上的时间是完全同步的。我们看一下桑塔格，她志愿沿袭和发展 2000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兴籍法语华侨作家高行健在见证文学“系谱学”上考察文学的真实性的路数。可是，我们都知道，桑塔格的第一部小说就是虚构小说，关于梦的。她曾指出，“塞尔日继续说，小说家遵循的是‘比眼见的真实更丰富也更普遍的真实’”^[2]（83）。她认为梦比现实真实。“那真实‘有时候几乎是摄影地吻合我见过的某些事情，有时候在每一方面都不同于它们。’”^[2]（83）她聚焦的是心灵的真实。这“在每一方面都不同于它们”^[2]（83）的小说家遵循的信念，可以被理解为文学还应该存在着一种真实，也就是为自己心灵作见证的文学，日本贵族爱好“私小说”，不入流的拙劣的自然文学称之为“心景”，我们界定为人权见证小说。你想阿，为自己的心灵的历程作出见证的文学，不是在事务的执行中将控制者推向人权法庭的申诉文学吗？在美国直接就可以界定为“人权见证文学”。离开美国呢，色情文学是个记录文学不错的选择。

1 文学遗忘与非凡声音：维克托·塞尔日见证文学的“母语迁徙”

苏珊·桑塔格为她眼里“二十世纪最迷人的伦理英雄和文学英雄之一的维克托·塞尔日”^[2]（57）作的精彩辩护，开篇就不平凡。她以一连串的“是不是”^[2]（57）“拷问了”她的文学英雄塞尔日何以“受到忽略”^[2]（57）以至于“默默无闻”^[2]（57）。这一迷惑很像关于女主人公总是会不幸与悲伤女配角却能得到幸运与自我的英雄罹难美人受宠的“多余人”巧妙“翻身”的传奇的寻根究底。桑塔格几乎是以反讽的笔调为塞尔日的迟来的声誉鸣不平：“是不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完全认领他？”^[2]（57）“是不是因为他不是——大家熟悉的模式——一位间歇性地参加政治党派和斗争，就像西洛内和加缪和库勒斯和奥威尔那样，而是一位终生的行动分子和煽动家？”^[2]（58）“是不是因为——在参加所有这些分散注意力的活动的情况下——他写得太多？”^[2]（59）“是不是因为他的大部分著作不属于文学？”^[2]（60）“是不是因为没有任何

民族文学可以完全认领他？”^[2]（61）“是不是因为无论他作为文学作家有什么地位，都总是政治化的，即是说，被视为一种道德成就？”^[2]（62）“是不是因为他生命中有太多双重性？他自始至终是一个使他成为右派憎恶的好战者、世界改进者（即使——如同他在一九四四年二月的日记中指出的——‘问题已不再具有它们以前那种美丽的简朴性。’”^[2]（63）“是不是因为他直到最后都继续自认是一个革命者——一项如今在这繁荣的世界已声誉扫地的志业？是不是因为他似乎最不合情理地坚持——还敢——怀着希望？”^[2]（63）“是不是因为尽管处境艰难且屡遭挫折，他的文学作品却仍然拒绝运载忧伤的货物？”^[2]（64）“是不是因为他的一生在历史事件中如此大起大落，使得他的作品黯然失色？”^[2]（65）不愧为有着“世界公众的良心”美誉的作家，桑塔格“一上来”就摆出为塞尔日辩护的十条“是不是”，每一条都是如此地触目惊心，不是“直抵人心去了”是拷问公众的良心与良知。触犯俄罗斯民众的拷问也许也是不受欢迎，但是命运不随虚假，记忆不容混淆，信念真理犹存。于是，桑塔格以理由充分地雄辩，塞尔日不应该长久地受到“实际上”的忽略与轻视。

在“不应该”与“为什么”“之间”，桑塔格非常理智地分析了她眼里的塞尔日之所以受忽略的理由。简言之，“由于他正确，所以他作为一位小说作家便遭到惩罚”^[2]（65）。为何正确的言论或檄文“不管”艺术性如何都没有人爱听？因为正确的预告或结论打破人类的幻想。可是从事革命的事业不就是在讲出真理但是是以倾斜的方式的基础上勾画理想图景吗？作为一个艺术家，艺术可以是谎言，可是作为一个革命家与改革家，到底还是艺术应该服从于信仰。讲出真话，不管一时之间有没有听众爱听，至少在未来的读者和历史的审判面前，革命家永远是问心无愧。这就是桑塔格为塞尔日激情辩护的动力。桑塔格为塞尔日没有得到公正评价的文学价值寻获到一条值得深思的理由：“塞尔日那些小说，主要都是被誉为见证；激辩；充满灵感主义的新闻主义；小说化的历史。一个其主要著作不是文学作品的作家的文学成就，是很容易被低估的。”^[2]（61）谁说见证文学就必须是文学的遗孤，拿这个文类与体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高行健以后一定还会再出一个。新闻也好媒介也好都是宣传舆论与承载信息的工具，传递与传播信息的真实与及时是新闻业存在与

发展的根本要诀。你不遵守这个界定与行规，就不能称得上是一个媒体人。不是媒体人，就自然不能拿媒体人的身份采访两会，介入社会。这是一个职业操守的准则，你不守职业准则，就如同爱情不守爱情契约一样，都是很恶劣的行为。把这样的影响散播出去，丑闻也好绯闻也罢，传递的信息智慧不是智慧，价值不是价值，因为你远离了专业的根本。有观众关注你“是不是”的话题，很难说不是专业就是绯闻，这不是一个辩证或者错位的逻辑。依靠绯闻炒作名气上位的网红行为，在这个信息化不够透明公开的新时代，这个喜欢追求读者共情的新时代，依然越来越不是新鲜的话题。从芙蓉姐姐到“知性记者”，一个比一个豁得出来不要脸的自我。文学的极限就是厚脸皮这句话的确是真理的面貌，可是文学的价值除了虚构的艺术，最高境界是真实，不是身体的真实，是精神的真实。身体写作是另一个话题。我们认为，身体写作实际上是非常高雅的非常直接的文学，反映的是个体的追求真理与探索极限的绘画写作，强调这一点，是非常坦率的私小说性质的写作。身体写作，身体是写作的媒体，写作是身体的追求。不写作的身体，成为镁光灯下聚焦的身体，以营销自我为价值导向，甚至宣传这一主流的身体替代写作的价值观，是我们这个时代信仰崩溃的先兆。任何一个党派，都应该弘扬最新的价值动向，尽其可能引导多元价值的包容。但是，什么是真正先进的文化观念，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什么是低俗跟进的重复建设，什么是虚伪的捞金观，不能区分或者不愿意区分，因为害怕触及自身的既得利益与现成地位，这样的保护自己的命运而不考虑命运共同体的命运，是不配成为一个文学流派的倡导者的。

由此，桑塔格把见证文学“是不是”文学作品的问题摆了出来。即使对此问题我们不予议论，还是有一个问题在我们的意识世界早已与桑塔格达成了共识：衡量和评价文学作品是不是经典，文学作品的体裁往往居于次要位置，而文学作品的“声音”，也就是在文学作品里传达出来的个人的非凡声音及其所代表的理想信念，应该是无论什么时代背景都应该得到公认的标准。我们暂且不去“争论”塞尔日的文学“是不是”见证文学，他在文学作品里因为寻找真理而发轫出来的非凡声音，也应该早已被“本城和墙外”（刘文飞）的世界接受。这与布罗茨基因“母语迁徙”而荣获殊荣的人生际遇不同，塞尔日是绝对的侨

居的他者。因为某种命运的故意的恶意，他顽强地没有把自己当作事件的“局外人”，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地在所有希望他不在的意识，没有因为命运的不济甚至算计而失去热忱与信念，他的信念来自于小说的意义，他的在源于内心的责任，这是一种无法体认却难以言喻的被点名被恶作剧却选择从孩童迅速成长起来的历史的使命感。就像皇帝的新衣里的孩童，他的眼睛能够洞悉所有的谎言，却不愿意说破，因为不屑。成人世界应该是充满责任，成熟，理智与引领的，大人国的败坏与贪腐却要以小人国的稚嫩，冲动，撒谎与逃脱为打扮，这样的人间丑剧闹腾到什么时候才能告一段落阿，这样的感慨桑塔格与塞尔日一分钟都不会有。因为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不在这里，却在那里。响亮的声音，究竟命运了谁，这个谁代表着什么，三十年的图景能实现吗？命运了多少配角，这些配角怀着什么样的信念，情愿带来什么样的人生的规划？桑塔格与塞尔日都不爱听这样的命运的声音，不是因为命运的先声而必然对立与排斥，而是被不负责任的感觉真的太糟了，连唐璜也安慰不了这颗心。一颗心系在自己的命运，是勇敢的智慧；一颗心无视共同体的命运，是反智慧的反勇敢。负负得正的定律在真正非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发展面前几乎是零。这个零不是价值的零；这个零是人类记忆的零。每一段并非无知无畏的命运的悲惨都必须逮其真凶，绳之以法。有一个故事必须作为睿智的讲义与大家分享：布罗茨基是每一位搞俄语研究的学者都不会陌生的世界级的作家、诗人，他的命运不仅仅是通向斯得哥尔摩，他的命运是誓言永不回归俄罗斯，他情愿死在俄语中。为什么？因为纵然他身负殊荣，仍然不能弥补他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离开自己的挚爱的仇恨。那些他昔日的文敌，一步一步把他逼迫到不得不母语迁徙到美国，寻觅自己的一席之地。在他很快功成名就以后，他丝毫不感激这些驱逐他的人的主观妄念，甚至正面写作控诉这样的暴行的没有人权。他非常智慧地告诉后世的读者，美国虽然是人权国家，但是美国不是他的祖国，他再爱再感恩桑塔格都不会娶她为妻，他的眷恋和爱情至深地永远停留在俄罗斯的土壤和空气之中，在圣彼得堡的钟声与建筑的幽灵的徘徊。他每一次午夜魂牵梦萦，再怎么悲伤他都用理智控制了自己衣锦还乡的被邀请。为着他真诚的恨，伟大的普京总统亲自来到他的坟，跪了下来，高傲的膝盖的降卑，一个伟大的灵魂对另一个伟

大的灵魂的深刻的理解，这一瞬间是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历史长廊中最感动人的画卷，是一个非凡的分水岭，从此，我们懂得旅游的文学与祖国的堡垒不是绝对的对立，和谐与发展才是这个世界美好的主旋律。诺贝尔和平奖应该授予这一伟大的时刻，授予这位拨正俄罗斯民族人心的伟大的领袖！

桑塔格申辩，塞尔日在小说方面，他应该被视为一位俄罗斯作家，因为“他心中牢记着文学中的俄罗斯声音的非凡延续性——其祖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2]（61）。特别看重文学“道德使命”的桑塔格指出，塞尔日在他的小说里不同寻常的声音，来源于“塞尔日描写他曾生活过的一个个世界，而不是描写他自己。”^[2]（64）那一种不同寻常的声音，“禁止自己产生绝望或懊悔或迷惑这类必备的语调——大多数人所理解的文学语调——尽管塞尔日自身的处境越来越黯淡。”^[2]（64）塞尔日的非凡声音来源于追求真理的赤子之心，这才是文学作品最基本的也最难得的品质。张杰同志著书提出“真理探索”，无数的革命先驱走上真理解放的道路，无数的有识之士践行真理价值的改革的事业，古今中外，信仰真理的命运不以一己之身的悲惨而悲观，不因自己的不幸福的婚姻而暴行，不靠危害与侵略来惩罚命运的恶意。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命运，以国家命运计，何尝不是一种恨？

塞尔日的作品之所以接受的过程被历史不公正地延宕，他的声音之所以倾听的瞬间就注定了无法回避的卓越超群，这冰火两重天的区别，竟然用桑塔格的话来说，是因为塞尔日写作的见证文学实现了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迁徙。有一个长期被我不忍相见的专家学者李葆嘉用“母语迁徙”来概述被移民的文学，在我看来，对母亲的情感如果能与对祖国的情感相较的话，对父亲的情感就成了在路上的情感？这一感知可能不尽然，语言是交流与交通的媒介，说其是工具是事实，人类凭借语言表达信息，人类被桎梏于语言的羁绊。人类的精神可以栖息于语言的构造与演变，人类的灵魂时刻渴望挣脱语言的禁锢与驱使。我们与语言的关系是必须服从语言本身的规律，同时我们与语言的关系不是索绪尔式的任意性，这种任意性是一个长长的职责，他/她以语言为载体承载的是我们对自身文化记忆的建设与发展，这不是一个长久的语言信念，过了我们身胤的语言契约，我们一定能回归到我们真正的家园。这样的命运与信

念将我们团结在一起，从起初便没有刻意验证命运的设计。妒嫉与憎恨这样的命运的他者/她者不从自身命运的主宰入手，不从道德文学的窗口阅览，将不甘心变为来拯救我们的命运来算计我们的道路，这样的敌人的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坦言道，人类从风水设计自身的命运是老祖宗的智慧，是生态和谐的馈赠，是不危害他人/她人的利己，是光明正大的旺门庭。在每一个民族的流风遗俗中都会有这样的希望，这是非常合理的也是非常智慧的。若是心生羡慕你可以学习讨教，打铁还需自身硬，每个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是美国建国以来的信仰，每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与努力爬上社会的阶梯，社会的阶级是流动的不是固定的。我们信仰这样的价值观，憎恨自己不努力把希望捆绑与消费在无辜她人身上的民俗。这一句话会犯众怒，但是真正的改革家有勇气失去虚假的追随者，这是政治智慧，虽然斗争不是本愿。一个提示一个宣传，在国家舆情上是善意的，政治上是正确的。可是这样的宣传同时是禁忌，不被使用的不能随意效仿，这样的无知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好比说，习近平能指挥打仗杀敌，你能杀害你的敌人不坐牢吗？习近平可以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你能志愿者服务也享受吗？这样的真理说出口几乎是妇孺皆知的常理，可是你却要偏偏在另一方面挑战。辩证法的发明人可曾承认和接受你的因为不甘心的挑战？说真话，说了真话若要遭遇封建主义对这样命运的庇护，遭遇不肯接受良药苦口的爱的教育的其他流派的观念，不要忘记真理的背后有政权，有军权。对付把自己的命运捆绑在自主命运发展的有良心的主体身上的各种计谋与借口，我们重温毛主席的一席话：“对待敌人要像冬天般残酷”。有些敌人，是因为不懂道理，或者一时受到了蛊惑，我们是要教育先行的。

在职业上，塞尔日是世界主义者，他能流利地操五种语言：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在写作生涯上，他是一个用法语写作的俄罗斯作家。桑塔格介绍他，“这意味着塞尔日依然在法国现代文学和俄罗斯现代文学中缺席，甚至连注脚都谈不上。”^[2] (61-62) 伟大的文学史不真诚欢迎自己的先驱，继承人，创新者，发明人和接班人，这在任何时代有良心的读者和观众看来都是不可理喻的，为什么双重缺席宁愿放弃所有的愿望都必要严厉查审罪魁祸首及其顽固余党。塞尔日的双重缺席不禁让我们联想到桑塔格的世界诗人情人、一个用英

语写作的俄罗斯作家约瑟夫·布罗茨基。这个是流亡作家，是世界主义者，是旅居异国他乡的俄裔作家，为什么塞尔日与布罗茨基的文学接受如此殊途同归？流亡诗人布罗茨基在小说和散文、俄语和英语两个领域与两种语言里都做到了“凯旋”：“布罗茨基借助《悲伤与理智》一书的写作和出版，已经让诗人和散文家的名分在他身上合二为一”^[6]（25）；而这个塞尔日生命中有太多双重性且始终坚信社会改革的信念，他坚持写小说、写回忆录、甚至制定了写作规划，却双重缺席于法国现代文学与俄罗斯现代文学。仅仅是因为塞尔日改变了母语语言？一生追求正直和良知的塞尔日在法语世界的被湮没，真叫我们对法国“作为世界道德中心的特殊使命”产生了怀疑。^[7]（344）

法国，在桑塔格心目中，可是她少女时代的梦想之地，这个信念一直贯穿着她走向世界主义创作的写作生涯。她在“不灭：为维克托·塞尔日辩护”文章中，并没有对法国作为文学朝圣之旅的灯塔地位提出质疑，她发现了一个很有讨论价值的原因，这也许造成了塞尔日文学成就得不到接受的误解：“作为小说作家的塞尔日被两个似乎不能兼容的小说理念所吸引。”^[2]（78）为什么不能兼容？为什么两个优势都必须失去？为什么一定要不科学地促成自己不情愿的一个方面？为什么自己一定要在历史和存在都没有自己一席之地的场？为什么自己不应该拥有的是被剥夺的就可以起来？为什么自己的学识连平民出身的却奋斗方向正确的青年都不如？为什么自己的不幸福就可以就应当成为他人选择的裁判？为什么明明是权威却要今天还是不权威的卑下地位摆到卑下的卑下？为什么自己的不幸福要用文学的神秘面纱影响有情人？为什么对曾真心帮助自己拯救自己的亲人要因为自己的意识而忘恩负义？为什么不尊事实一天到晚从封建揭露人家房间里的甜蜜不是甜蜜？为什么自己丈夫对自己的付出和忍耐到了极限忍无可忍的出轨要怪罪到不认识的文学？为什么连起码的文学家可以对话的信仰都不遵？为什么有资格指出别人的爱情故事或者爱情新意必须以悲惨告终？为什么自己得到了文学的资源与一席之地相反要来诟病和诋毁文学的自由与天意？为什么作为法律的配偶却不按照法律的精神来执行自己的身为人妻的责任？为什么作为人民教师的席位却把争名夺利算计权威的诡把戏教授给青年？为什么身为人母不能将心比心地以慈母心肠来处理家庭问题不带到

社会上？为什么作为名人的后代不能真正从继承的角度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为什么作为名人的后代不愿继承不能真正知道感恩与反哺真正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为什么自己的不如愿要设计危害后起之秀造成社会发展生态的灾难而她宣之于口的信仰是生态文学？为什么自己得不到的爱情不仅要毁灭自己幻想爱情的对象的对象还要毁灭其他人对爱情的信念毁灭得不到的对象的心愿与身体？为什么在以无耻的无耻的揭幕文学揭示“出来”的过程爆料与揭示什么都不是爱情？为什么自己的生活寄生在自己愧对的丈夫的“所得”还要进一步与赐予自己薪水的职业为敌？这样的人品的文学家究竟是怎么命运到场的？她的记忆是真实还是虚构的？她的信念是什么？研究她的人生轨迹，揭示她的内心图景，又是一个可以提供给奋斗的青年的课程。我们必须时刻谨记一句话，真正的智者不听从她/他人的意见，局设这样的人设收获这样的无奈说得出口。一代人的不济不会损伤一代人的退出。无奈遇上的任务绝对不是命运的恩赐，从源头上理顺关系，清除流弊，斗争无赖，制定法规，必须放手让连贯的主体作出理智的规定。

“一个是历史全景图，在这全景图中一部部小说都作为一个大故事的一个个小插曲而占一席位。”^[2]（78）此处也可记为都梁的家国五部曲缺席于外国文学缺席于军旅写作缺席于部队后勤的提示。这样的三重缺席的命运，记忆和信念，必须由比桑塔格和塞尔日更高明的作家来辩护。在努力腾出时间完成他的写作编年史的系列写作时，“另一个关于小说的理念正在影响他，这个理念在一定程度上颠覆第一个理念。”^[2]（79）真正的俄罗斯文学的杰出小说正在突围正在形成。这一场揭幕运动对历史命运，文革记忆和小说信念都是一次无法遗忘和原谅的纪念。博爱再也不是命运的笃信，文化再也不是命运的记忆，爱情再也不是命运的信念。！“塞尔日的小说显示在如何叙述和达到什么目的上有几种不同的观念。”^[2]（79）这不正意味着俄裔作家的他没有数典忘祖，相反他是巴赫金小说理念“对话”与“多声部”的自觉继承者吗？数典忘祖除了文学悖逆，还有意愿违背。正义自在人心，真正的爱情的痛苦不容揭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时代的不幸与停滞，这些都可以随着发展而得到宽容。唯有爱情并非一己之身的失误的失去，会变为长久以来的不能释怀，变为久经不散

的自我逃避。被诡计窃取的爱情的悲伤记忆，宜被安抚与安慰，不宜被揭示与撒盐，这是人性的善良与否的问题。至于爱情何去何从的问题，自有自身做出抉择，岂容她人以催促和逼迫来催促和逼迫社会？这一点政治智慧是必须要有的。看来，塞尔日的被湮没、被忽略的命运，并非仅仅关涉语言与小说观念。“图拉耶夫案件结束了”^[2]（87），但是他的创造者塞尔日的文学公案才刚刚揭开序幕。

2 政治流亡与广泛对话：维克托·塞尔日见证文学的史诗维度

苏珊·桑塔格眼里维克托·塞尔日“出生以来就是政治流亡者”。事实如此。“他父母是沙皇暴政的反对者，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逃出俄国，塞尔日则是在一八九〇年‘碰巧出生在布鲁塞尔，在横跨世界的旅途中’，他在《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中如是说。”^[2]（57）维克托·塞尔日应该算得上是在现实层面而不是心理层面对“逃离”^[8]理解得最为深刻的作家。逃离父母对沙皇暴政的反对的同步演示，塞尔日只忠贞于自己的小说时间和小说信念。上帝把他的一生紧密地与“逃离”扣结在一起，塞尔日几乎是从未后悔接受上帝“给”他的试炼：他作为逃离希特勒的欧洲和逃离随时可能向他下毒手的斯大林的暗杀者的赤贫难民，在墨西哥城完成了生命消逝前的回忆录《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避难墨西哥之前，他曾在六个国家生活、写作、密谋和搞宣传；比利时，在他少年时代，以及在一九三六年；法国，多次地；西班牙，一九一七年——他就是在那时采用塞尔日这个笔名；俄罗斯，他一九一九年初第一次见到的祖国，当时他二十八岁，此行是为了加入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二十年代中期在德国和奥地利，参加第三国际的活动。他在每一个国家的居留都是临时的，充满辛酸和争执，受威胁。在其中一些国家，是以他被赶走、驱逐、不得不离开告终。”^[2]（58）这是塞尔日不同于哈尔滨俄侨的命运文学。母亲资深革命家后代的身份给予塞尔日的全部是苦难而不是恩赐，因为母亲是那种坚决不后退绝对会坚持斗争的革命家。母亲不懂得对时代先妥协，不懂得不要说话，不懂得不要演示，一味地以她人的错误惩罚塞尔日，因为这是塞尔日的命运。在塞尔日眼里，母

亲是在绝对的基督教里无法自拔，她笃信履行自己的职责，拯救民族的命运到最后一刻，坚决与反革命余党做斗争。而塞尔日的父亲却拥有巧妙的多的政治智慧，懂得妥协的政治是通向成功的中间道路，只有时间才能清除信仰上的敌人。父亲的温和主义的逃离政策，使得塞尔日不仅流亡于祖国而且流亡于家庭，他起初是绝对的无意于政治生涯的规划的，是各种不同的意图命运他的作家梦找上他的。这场广泛的对话提供给塞尔日普遍的人性的温暖，提供给他一种类似美国梦的奋斗的信念。这种信念与出身和背景，与各种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都没有瓜葛，是非常单纯的文学的对话和交往。在广泛的对话的多界面的语境中，作家离自己的内心越来越远，但是关于未来的抱负与愿景的设计越来越清晰。

桑塔格在“如实”记录塞尔日的流亡历史时，她的挚友祖国俄罗斯的政治流亡者约瑟夫·布罗茨基肯定是存在于她的脑海中的。塞尔日的出身，他的父母与布罗茨基的父母不同，从来没有对安全安稳的生活抱有过幻想。他的父母旗帜鲜明地反对沙皇暴政，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已逃出了俄国。布罗茨基一家人，比塞尔日出生的革命家庭“温和”的多，直到布罗茨基被赶出了俄国，流亡美国的他还在试图以英文写作“带给父母亲一些自由”。塞尔日的流亡，他的现实经历，与布罗茨基在美国定居谋得一份教职后从容适意地世界旅行不同：塞尔日的流亡，几乎每一分每一秒钟都是在对严酷的生活，政治的逼迫坚持着不妥协的斗争，为自己的信仰和生命进行着写作的抗争。塞尔日可称得上是桑塔格心目中当之无愧的“勇气和抵抗”^[2]（185）的文学代表。政治的逼迫时代的残酷在塞尔日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的妥协，他每一分钟都在严厉地对抗与写作，他相信甜蜜的面包在天上。因为塞尔日亲身经历了与布罗茨基不可同日而语的流亡，他的甜蜜的面包在嘴唇上，就是桑塔格的情人地位。拥有了安慰的作家立即将苦难转化为道德的力量，遂展开了一场政治流亡史有史以来最激动人心的对话。同情，肯定他的他的辩护人的亲密战友布罗茨基，某种程度上可算得上是塞尔日的“同路人”，这个同路人的政治策略南辕北辙，对逃离的恨却几乎一致。布罗茨基远离时代，笃信语言能拯救命运。他写作中却更多地关上心门而不是敞开对话，因为了解和理解他的作家的名言都镌刻在墓志铭上。他没有时间顾及读者的意见，因为他要从事考古性质的写作研究。在诗歌的传统与

创新之中，埋他头与前辈诗人奥登等人对话。同为流亡者，其境遇和心境如此不同。桑塔格不袒私情，维护和赞誉塞尔日的英勇顽强。证明了桑塔格享誉全球的美誉“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心”名不虚传；更彰显了见证文学或曰证词文学本身所拥有的文学伦理价值。我们称谓某文类为“伦理文学”与“道德文学”，赋予该文类以价值和倾向，与文学的美感与艺术不是绝对的割裂，而是最好的情感即是道德，最高的艺术就是伦理。相信文艺必然是不道德的，与相信进步必然是虚伪的一样，命运与正面的命运完全是矛盾，哪一个方面也不是和谐的。逃离是一种相当难堪的命运，主动的离散的文学，尤其是侨居在自己适意的文学天地的命运，注定是非常杰出的是非本我的。这样的文学的价值在于克制一己的欲望，用不是自己的笔完成命运交托给自己的任务。这样的信仰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小说信念。当我们回顾文学的命运时候，我们自己联想起中国的哈尔滨俄侨文艺中最突出的俄罗斯冰雪芭蕾舞艺术与俄罗斯命运小提琴及其反面的恶作剧小说。想起这些“惧往矣”的“风流”，用一句张作霖与苏俄关系的“京华烟云”可以回忆。往事素描，勾书起多少文学资源的交通，又岂在眼睛所能看到的“山舞银蛇”。为什么要旧事重提？如果是命运的善意，那么她的效率又在哪里呢？那一抹亮眼的海蓝色，勾画起往日的追求如今变为无梦的生活的江河日下？颜色革命又将上演，可是真正提供颜色庇护的女主角她却倒在了命运的捉弄。原本我们都沉醉在塞尔日的小说信念，可是意义的聚焦抵抗不了颜色的聚焦，因为我们的选择与相信在别人看来是在坐牢。就算是坐牢，你知道吗？这个塞尔日竟然遇见的“彼得堡”的堡主说了这样一句话：“有一天我坐牢了，谁来给我送饭看望我呢？”塞尔日有两个知性读者。

塞尔日三十九岁写小说，在桑塔格看来，这意味着一个小说家的“大器晚成”。塞尔日的第一部小说叫做《坐牢的男人们》。“这时他已用了超过二十年时间撰写丰富的专业历史评论和政治分析的著作，以及为报章撰写大量卓绝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文章。”^[2]（60）为什么撰写政论文章？为什么在逃离祖国后心系祖国的命运？因为塞尔日信仰政治。因为塞尔日相信未来读者。因为塞尔日把寄望停留在国际主义。

桑塔格告诉我们，如果人们记得塞尔日，一般是把他当作“一位果敢的持

不同政见的共产主义者；一位有眼光的、勤勤恳恳的斯大林的反革命的反对者”^[2]（60）。更重要的是，“二十世纪的小说家没有人像他那样拥有反叛、与划时代的领袖们紧密接触、与奠基性的政治知识分子对话的第一手经验”^[2]（60）：

他认识列宁——塞尔日的妻子柳博夫·路萨科娃曾是列宁在一九二一年的速记员；塞尔日曾把《国家与革命》译成法语，并在列宁一九二四年一月份逝世之后不久写了一部列宁传。他与托洛茨基关系密切，尽管他们在托洛茨基于一九二九年被流放之后未再见过面；塞尔日后来翻译了《被背叛的革命》和托洛茨基晚年的其他著作，并在托洛茨基比他更早在那里做政治难民的墨西哥，与托洛茨基的遗孀合写了一部托洛茨基传。安东尼奥·格兰西和格奥尔格·路卡契也是塞尔日的对话者，在他们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全都生活在维也纳的时候，他曾与他们讨论过那场革命几乎立即就在列宁领导下变成暴政的问题。

《图拉耶夫同志的案件》的史诗式主题，是这个斯大林主义国家在三十年代杀害数百万共产党忠实信徒和大部分持不同政见者，塞尔日在书中讲述一种他本人最不可能逃过却侥幸逃过的命运。^[2]（60）

塞尔日不仅与俄罗斯划时代的领袖们紧密接触，直接或间接对话，这不是塞尔日的计划；他与其他流亡者也是尽可能的对话交流，结果他的拥戴者因为他被托洛茨基开除出党抛弃了他，可是他作为中间人的信仰一直没有放弃和他联系；在他一九三四年初抵达布鲁塞尔之后，塞尔日就寻求与纪德接触，他给纪德寄去一封信，谈论他们对文学自由的共同看法，这时候的塞尔日单纯的文学交往寻找政治共识；在纪德回法国之后，他们的秘密会面以纪德是高高在上的权威，是承接“伟大作家”^[2]（70）衣钵的大师，而“塞尔日是败局已定的事业的骑士，居无定所、贫困、永远处于险境”^[2]（70）告终，但是塞尔日以“非常愉快”的理由终生的铭记；他与一名流亡的西班牙同志合办过一份政治杂志《世界》，西班牙的同志找到塞尔日，提供给他比骑马更主要的政治任务；他开始定期为海外几家杂志写稿，但是——尽管有一些像纽约的德怀特·麦克唐纳和伦敦的奥威尔这样有影响力的仰慕者努力为他找出版商——塞尔日最后三部长篇小说、最后的短篇小说和诗，以及回忆录，直到他“死后”——大部分在他死后数十年——都一直没有以任何语言出版。为什么他的西班牙同志

没有轻易帮助他完成出版工作？为什么在世界上没有翻译热心从事译介塞尔日的流亡思想？为什么塞尔日的政论与他的远离政治的小说一样乏人问津？为什么塞尔日交流过的作家迟迟地对他的出版与发表持观望态度？为什么塞尔日的对话没有追随者和世界记者？这些也是谜题。为什么死后声名是一个作家唯一的命运。

塞尔日是一位广泛对话却惨淡“收场”的终生都在实践的知识分子，一位直到最后他都继续自认是一个革命者的文学家；他的充满激情的广泛对话，却“没有加强他作为小说家的可信性”^[2]（63）。这一点是桑塔格最为他抱屈的地方，也是我们作为专业读者所不能理解的地方。表面看，塞尔日不仅与划时代的领袖、知识分子、作家们对话；他也和布罗茨基一样，虽然已流亡被成为“世界文明的孩子”，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俄罗斯民族文学继承者的使命和担当。为什么塞尔日不能赢得如布罗茨基一般的命运呢？而且塞尔日在小说中表露的对革命的信念比布罗茨基通过写诗和散文的思考来得直接得多，他的侨居生涯却始终没有某位文学家或芭蕾舞舞蹈家的阴庇。是塞尔日太过清高呢还是塞尔日遭遇悲惨呢？更多的档案材料的揭开将会解开这一疑问。我们可以作出判断的是，塞尔日缺乏某种斗争的智慧，这样的智慧不一定是妥协的策略，也可能是伪装的智慧。与敌人为伍甚至是和谐敌人，为了争取时间争取最后真正消灭不和谐的因子。敌人如果早已熟悉妥协的套路，来一个更隐蔽的神秘面纱的诱惑或者更悲壮的以命相搏的妥协的牺牲，真正的心肠与意图如果我们擅于分析的智慧，是能够辨别清晰的。也许有些敌人她以人类最高价值最宝贵的爱情的挑战或拿捏作为斗争的武器，但是精明的猎手一定能够逃避她们的骗局在最出人意料的时刻出现惩恶扬善。这样的西班牙同志的智慧塞尔日无缘聆听。好运的是彻底的西班牙文艺性是真正的印度性的身体，不会令同志这一趟打猎的人生失望。打猎路上会看到很多的动物，姿态各异，声音有别，只要同志坚定信念，明确目标，每一天都应该到树林中过猎手的生活，而不是因为几个动物放弃了一整片的树林。

塞尔日“心中牢记着文学中的俄罗斯声音的非凡的延续性——其祖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和《群魔》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契诃夫，

他们在当代的影响见诸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伟大作家，尤其是鲍里斯·皮利尼亚克，《荒年》的作者皮利尼亚克，还有叶甫盖尼·扎米亚京和伊萨克·巴别尔。”^[2]（61）塞尔日在《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里悲痛地记述：“我们留下的，是一场胜利却走错方向的革命。”^[2]（63）塞尔日宣称“这些是我们仅有的可能道路。”^[2]（64）塞尔日在最困苦的时候都坚持相信：“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对人类和未来更有信心。”^[2]（64）不在桑塔格看来也了解，这是信仰的激情与爱情的色情的双重激励。

在桑塔格看来，塞尔日的不屈不挠的惨痛的下场“吸引”着我们，一方面因为他的坚定和抵抗；另一方面因为，与此同时，“无论他在哪里，都无法不怀着兴趣、不受激发”^[2]（64）。兴趣是天生与习得的一致，被恶意激发的幸福宁可放弃。“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兼可抛。”真正的幸福是自己的决定，一个已经身败名利的妻子，即使还她自己的全部天赋异禀的成绩，仍旧不可能冀望接受爱情的来临。一个已经被逼背叛自己祖国的作家，即使在他生前死后以无数的功名弥，依然不可能换回他坚定不归的骸骨。这不是一个有节操一个有骨气的女性应该明白的最基本的道理吗？这不是一个看透了人性却希望人类的进步可以带来改变的作家的信仰吗？有很多的逃离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即便在这一代这一路无法思考这些残酷的命运，20年以后难道始作俑者就能逃离了历史的耻辱架？踩着基督精神的肉体取得的光辉能照亮多少人前进的脚步？不能原谅和宽容是每一位流亡作家的倡议。

塞尔日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笔，见证了流亡这个词语最大程度的悲惨与悲伤。他自觉继承的巴赫金多声部对话，只为他的流亡日子带来了片刻慰藉，紧接着便充斥着动荡和不安。“吃俄罗斯文学的奶长大”^[2]（67）逃离了俄国暴政的塞尔日，在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力量中寻获到一种正义抵抗的勇气，吃什么问题造成的下放的山奶疗伤的逃离历史真相与历史责任的某同志？，在哪里的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力量中寻获到继续拉历史的皮条的智慧与可能？。虽然塞尔日和同志们没有及时得到民族文学或异国文学的“认领”^[2]（61），好在历史终归是睿智的领导人拨乱反正引领的，历史是有良心的人民见证和书写的，公平和正义的天平通过桑塔格的笔赐予了塞尔日，被真正的志愿者接过来作为

证明的工具：他不用再辛苦地“解释他心目中的小说真理的广度”^[2]（78）。他的苦难见证文学“等到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心”为其颠沛流离依然“联系”依然“不灭”的良心作了历史的见证：“塞尔日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他自己动荡不安、充满危险、道德上忠直的一生；塞尔日的著作要比那个写它们的人更好、更有智慧和更重要。”^[2]（65）什么是最重要的如果不能为自己所扎实地做好把握，侨居的割舍亦不能换回与自己的理想的希望，难道说这个世界的起初的博爱真的是一场对人民的欺骗？必须以欺骗来回击这个时代的进步？塞尔日不够狠心，普希金的“青铜骑士”的登场是偶然的，青铜器的鼎力相助也敌不过农奴要翻身。

3 记忆唤起与真实追求：维克托·塞尔日见证文学的真理探索

塞尔日在日记的一个条目（一九四四年三月）中，曾这样解释他心目中的小说真理的广度。他把“小说真理的广度”^[2]（78）与“复杂命运的交织”^[2]（78）、“对世界记忆的唤起”^[2]（78）联系在一起：

也许，最深的根源是这样一种感觉，感到奇妙的生命正在无可阻挡地消逝、飞驰和滑走，以及这样一种愿望，希望在它飞逝时逮住它。正是这种绝望的感觉在我约十六岁时驱使我注意宝贵的瞬间，使我发现存在（人类的、“神性”的）即是记忆。后来，随着个性的丰富，便发现个性的局限，即自我的贫乏和桎梏，发现人只有一次生命，一个永远受限制的个体，但这个体包含众多可能的命运，以及……交织着……其他人类的生命、大地、生物、一切。因而，写作变成一种对多个性的追求，变成一种体验各式各样的命运，浸透他人、与他人沟通……逃避自我的一种局限的方式……（无疑，有其他种类的作家、个体，他们只寻求自我维护，看不到世界，除了通过他们本身去看。）^[2]（78）

塞尔日从正是这种绝望的感觉在他十六岁时驱使他注意宝贵的瞬间，使他发现“存在即是记忆”^[2]（78），到意识到“小说的核心是讲故事，是唤起对世界的记忆”^[2]（78）。塞尔日唤起了世界对俄罗斯“女性命运”的记忆。“女性命运”被塑造成/非成为俄罗斯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图景的动态观念，对理

解俄罗斯国家命运与性格，俄罗斯民族感情和价值取向具有重要的意义。所有在俄罗斯民族文化记忆中偷取概念的女性命运和女性命运共同体，一方面在正本清源的俄罗斯民族民主命运的自由和希望是桎梏和绝望，另一方面提取异族文化的借鉴，融合外来文化的伪装，必将引导国之不国，民之不民。在俄罗斯诗歌和文学互文的文本时空中，偷梁换柱改天换日的替身文学的下场只能是互文的反讽与演示。女性命运的倡议必然引起文学聚合关系与文学观念的划分，利用场性分工的障碍，播撒泡沫的观念域、世界图景和语言模型，极大地危害着文化与心智的发展。没有通过立宪明确规定命运共同体的承载人的身份，谁是构成命运共同体的人物？由谁来推动？分工不明确的政治主体在所谓中俄新型国际关系的大国外交中能起到什么作用？所有的领域的合作必须务实有效，这是外交事业的应有之义，不值得大书特书。在新时代的外交事业的发展中，这叫新型外交关系的阐明与执行。命运共同体在中应该是宪法基础的律法执行，在外应该是对话基础的国际合作，同时也应该是回答外方对中国社会的好奇与探讨的中国方案与中国设计的模式及其灵活的外宣。中方无权将自己的命运共同体的设计强加给俄方接受，这仅仅只能作为外交活动的一种宣传。俄方视中国的主见为何种程度的“亲近”，在哪些渠道上取得发展的一致，这是事实上的命运共同体，往往宣传的不是第一位的。新型关系，新在提出构建的倡议人换了主角还是新在提出的实务的界定发生了创新还是新在合作的意义和内容出现了崭新的突破与变化？研究型的外交关系与经济为先导的市场合作关系究竟有没有在命运共同体的推动之下得到健康发展？还是我们到了倡议把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俄侨戏剧的观众的学习坚决限定在戏剧界？“蕾纳生斯”欢迎爱狄密勒。《道路与命运》是我们熟悉的中国的俄罗斯侨民作家伊里因娜的自传体文学。另一个视角看上海生活与萌芽写作，对崭新生活的哲理性思考与歌唱，真实地走上自己的新生活的创新，与自传文学的强迫症不可同日而语。自传文学是真实地记录自己作为文学传主的生平和创作，不是扮演作计以拯救她人命运为轰轰烈烈爱情的演唱会。非要强迫观众在场，还要强迫观众接受这是能歌善舞被蠢驴结束了，偏偏有女主角的监护人把蛇捂暖穿越时空。这可真的是另外一种文学传奇呀。自信从来是从事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的条件，在爱情中更是

如此。他就如她所愿上演了一出将计就计，谋的是文学的合法时空，也真是花魁都比不上的妓院文学场所了。从此以后，懒散无趣的贵族画家梦想起了《苏联文学》从封面，装帧，消息，短讯到长文的设计职责，另类小说的革命家遗孤梦想起了给变革以后的《俄罗斯文艺》输送说真话的小星星，照亮真相的天空。心里住着野火狐狸的假扮唯智主义的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为性感内衣的纽扣的孩子开始作起了文学结晶的梦想，准备用自然界的动物文学来讲课普世性真理的探索过程。好运结识与幸运结识俄罗斯文学的“玩儿文学”的女性命运，一段又一段法语芭蕾舞展演该是时来运转了。纳博科夫是最无法忍受迟到意识（belatedness）的，那么被迟到甚至被缺席还要再被不到是谁最无法忍受的呢？家园的失落创造出的文学景观根本不值一提，双重的打击是身为国家命运共同体负责人的必须承受的，因为国家与个人是冲突的。我不信这些政治错误需要的是学习，我宁愿相信这些废物为的争纳博科夫的文学传统。别人不屑争这个既成事实的历史，从事创新的文学事业，必须强迫改革家在传统中重复，因为幸福的不能兼顾而必须放弃创新的事业。双重的放弃换来双重的强词夺理，在俄罗斯文艺中我们想用一句“非俄化”亲描淡写异类。还有这样的命运共同体，专挑俄罗斯文学中主角不能逃脱悲惨的命运，配角不但能够拥有幸福美好生活，而且另意外的主角无比羡慕，甘拜下风甚至求饶告终。这样的小说自然有，但是这样的小说如何能驱使成为女性命运的脚本？给你改编的时空主角回赠的岂不是一段音乐旋律的舞蹈情缘，连改编都是懒得。《卖苞米者》的改编者即将走到幕前。激动人心的命运交响曲才刚刚开始。俄罗斯人民新年爱收看重播的电影《命运的捉弄》，苏联著名导演梁赞诺夫1975年拍摄完成的电影杰作成了每一年中国新年俄语爱好者的保留节目。恶魔式的作家政治的好戏刚刚苏醒，脚手架又要在寒风中冲击他的夜叉。意大利，法兰西和丹麦的芭蕾舞的革新和发展岂是俄罗斯芭蕾舞的对手？我们想签一份《奉俄协定》，赌书消得泼茶香。谁输谁手绘，60万！你问我这是不是过渡性的神话我哪里能够知道。乌苏里的老虎也不会告诉我听的。“哪里有人参，哪里就有老虎。”这句黑话送给您，作为一个接鼓传花的暗语。最缺乏中国土壤的作家看你往哪里跑！有很多的小提琴协奏曲要进俱乐部演出，防不甚防。首席不是什么格鲁吉亚比利斯歌剧院

的鼓手，就是你那一段新疆地区的果尔谐的音乐，分明自己就是首席。东北鲁艺班子里没有你，你的命运也应该“伪装”成为一个什么共同体。在女中音巴拉诺夫斯卡娅的直线进军中寻找意义的意义。再不成就到轻歌剧院里寻找自己社科院所长的身份，《西里凡》是最好。随着中东铁路第一根枕木的落下，城市风景油画的出版，文学的野心被熊熊的烈火点燃，前方是被遗弃的将军的头衔。黑多克的“诡秘”写作曾试以阿尔泰语描绘一种把曾经伤害自己的人和事非要搬上舞台表示自己已经对此云淡风轻的自我折磨心理，管这个叫文学的吊诡。看来又要有文学的皮鞭要彻底的“革命”，贯彻执行理想的彻底性。“生死轮回”的爱情故事变得黯然失色，你这么多的诡秘的自反精神勾引起不明白的人进行真理探索，从一种自欺的心理的费解走进自我放弃的文学时空，收获一位退步作家的颜色革命的价值观。诡异的事情在世界上哪里稀奇？这样诡异的文学经典时空的吸引要折腰多少好奇的女读者，这又是一个理解与分析的过程。这也是建设者的心声。索菲亚和伊斯坦布尔的普希金与俄罗斯的普希金淑者更迷人？一个是设计自身命运的女性命运，一个是跟随真理探索的女性命运，各花入各眼罢了。一个的宗教叫做无智慧不合作，一个的宗教在东正教里寻找圣像神话的智慧。宗教不和谐因为一个的宗教要“和平”。你看这样的逻辑在美人身上会有多大范围的观众认可，你还不如去进行博彩比赛。但是还真的有不少恶意的继承者，下场只能是两个字“作死”。哈尔滨俄侨白银时代的世界生态文学的奠基人巴依科夫早就逃离了被批判现实主义文艺，奔赴法国象征主义绘画艺术的战场，反对偶发艺术与机遇剧。东正教是一个视角，东正教的舞蹈艺术是俄罗斯民族的慧根，这一点在美国的价值观和世界的艺术观上都是务实的。教堂建筑与世俗建筑的精华，应当伴随着音乐的跨国汇报演出，发展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许许多多的口头文学的散论与作曲都没有被录音，证明命运的概念早已提供给了女主角。同时，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来什么舞台，在什么场面，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真正的场面中人不在而在。昔日未竟的《霞光报》的事业的朝花夕拾，竟然是瞬间就比较出了不华而华的民歌。《上海柴拉报》也提供不了道德援助。

不同于塞尔日讲述的“发现”^[2]（78）“被唤起”^[2]（78）记忆的过程，

很像曾在苏黎世开业的以色列心理学家伯恩斯坦主持的以“寻回或唤醒记忆”^[9]（81）为目标的“恢复记忆”^[9]（81）的治疗。没有“记忆窃贼”^[9]（81）潜入他的“记忆空间”窃取属于他的“宝贵的瞬间”^[2]（78），塞尔日还是在见证文学尚未达到“日益增长的影响力”^[10]（101）之时，凭借历史学家的敏锐，就发现了记忆的重要性：“因为记忆能在抽象的学术研究与碎片化的个人切身经验之间架起桥梁。”^[10]（101）大屠杀的幸存者《当记忆来临》的作者弗里德兰德说，“当知识来临，记忆也将慢慢回归。知识和记忆是同一个东西。”^[10]（101）塞尔日是在绝望的感觉来临，记忆慢慢回归的，进而对世界的记忆在意识到“讲故事”是谱写“历史全景图”的过程里，得到了激发和唤起。历史和记忆这两种“向来截然不同的活动”^[10]（101）通过塞尔日生命感觉的复苏进行着互动，甚至达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

记忆被唤起的塞尔日，以追求真实作为自己写小说的信条。到了2001年，高行健在瑞典学院举办的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大庆学术研讨会上，已经早桑塔格很多年呼吁将对真实的追求视为文学的标准：

今天要谈论的题目是文学与见证。如果说文学是人生存的见证，在座的想必都不会反对。而真实与否，对作为人之生存的见证的文学来说，是一个起码的判断，想必大家也都会赞同。在文学前面，除了真实，没有什么能令它屈从，在这个自由精神的园地，作家也只接受一个指令，那就是对真实的追求。其实，真实从来就是文学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如果这超越现实功利的文学居然还有其价值，还值得人为之受苦，还值得写下去的话。^[4]（10）

塞尔日正是以对真实的追求介入政治介入文学。桑塔格为他的强力意志般的介入辩护：“由于他正确，所以他作为一位小说家便遭到惩罚。历史的真实性排挤小说的真实性——仿佛非得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似的……”^[2]（65）。塞尔日用他的一生都在回答“生命是什么？”^[2]（66）的问题：“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生命意味着‘你应该思考，你应该斗争，你应该挨饿。’”^[2]（66）塞尔日接受这样一个基于历史的看法，认为他们的生活将“是由历史决定而不是由心理学决定，是由公共危机而不是私人危机决定的”^[2]（66）。塞尔日把对真实的追求视为对“一个人该怎样生活”^[2]（65），“我怎样才能使自己的

生活变得有意义”^[2]（65），“怎样才能使受压迫者的生活变得更好”^[2]（65）这些问题作出回答，他“以他的清醒，他的正直，他的英勇，他的失败来回答这些问题”^[2]（65）。读塞尔日的回忆录，我们很难不被他“那内省的能量、热情的求知、自我牺牲的准则和巨大的希望”^[2]（67）吸引。高行健向我们诉说，“古往今来，不仅仅是以历史和现实的真人真事为题材的见证文学，其实都是人生存困境的见证。”^[4]（13）塞尔日以“社会主义流亡文学的核心——革命”^[2]（66）的真实经历为题材的见证文学，其实不仅仅是“对人生存困境的见证”^[4]（13），更应该被视为是对革命理想和人道精神契而不舍的一份拷问。但是，我们必须记取困境不是通向革命的道路。

也就是被这份理想的事业所激励，塞尔日走上了“证词”^[2]（73）文学写作的道路。他谦逊地表示，“说真话只需要一定的清晰思路和独立性。”^[2]（76）桑塔格总结塞尔日的失败教训，指出了问题的复杂性：“确实会出现真理和公正可能不相容的情况。如果倾听一个我们乐意倾听的人讲述真理，就可能出现另一种结果。……”^[2]（75）桑塔格总结，“塞尔日献身于可钦佩的事业，不管是在性情上还是在原则上。”^[2]（87）塞尔日本人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越来越倾向于向小说而不是向历史要真实。“塞尔日并非只是要指出小说家的真实性不同于历史学家的真实性。”^[2]（83）他其实也并没有如桑塔格般相信小说的真实性比历史学家的真实性更优越。为什么对塞尔日来说“小说就是真理——是自我超越的真理，是替暗哑者或声音遭打压者讲话的义务。”^[2]（77）通过写小说，塞尔日把无可争议的真诚和才智倾注到以虚构的形式再现发生过的事情，从而以书面供词声讨“在由革命变成的这个独裁政权里没有立锥之地”^[2]（87）的国家。以写小说的方式探索真理，不是塞尔日的独创，然而他远远大于“政治小说”的见证小说，“把他自己当作一个媒介，旨在把声音赋予别人，很多别人”的“利他/她主义”^[2]（79）使得他的小说见证不仅拥有真理探索的维度，而且他的见证小说写于自身的苦难仍然执著于道义的慷慨。应该说，塞尔日最感人的力量莫过于他牺牲自己点亮他人的“古道热肠”：他相信，“小说的真实性有体现的作用，如同在塞尔日对人和风景的描写中所体现的浓烈的具体性一样。小说的真实性描写永远无法抚慰人的事物，

再以一种具治疗作用的，面向一切无限和普遍的事物的开放性，来取代那无法抚慰人的事物。”^[2]（88）塞尔日小说的学术价值是法学家对社会意识的分析与考证。女诗人和舞蹈家中国的俄侨作家安捷尔先漂泊的命运经过越南，印度，泰国，缅甸，尼泊尔，非洲，塔希提岛，她的人生足迹遍布“轻飘着苹果树之香”的带着松脂清晨的世界。在这里，风景秀丽，姑娘尽情自弹自唱。围坐在一起的国际合作的作家和政治家挽起手来，跳起马奶子酒馨香四溢的欢歌牧情，这是摇篮曲的春天的记忆，也是智慧之树答应带给森林好运的神话故事。在这里，巴黎音调和声音在美丽的牧歌中和谐在一起，蔚蓝的天空星星也调皮地眨起了不困乏的眼睛，偷窥着人间的至福境地。没有任何紧张，从来全部是欢快，因为爱情是一个女性的再生的父亲。在这里美丽不再是致命的，而是保住许多许多的诗人对幸福的崇拜陷入对爱情追寻的情网。从事管理女性诗篇页面的工作的有杂志《聚光灯》的秘书。优雅与天才的双丰收是可能的，只要拥有一个善良而不是良善的人类的慷慨。注意，不是想像的慷慨。

4 小说任务与写作规划：维克托·塞尔日见证文学的世界意义

塞尔日相信，“小说家遵循的是‘比眼见的真实更丰富也更普遍的真实’”^[2]（83）。“那真实‘有时候几乎是摄影式地吻合我见过的某些事情，有时候在每一方面都不同于它们’”^[2]（83）。为了遵循与追求内在的真实，塞尔日和桑塔格选择给自己制定“小说任务”。只不过，塞尔日与桑塔格走上的是截然不同的规划路线。塞尔日采用“多卷本的编年史”：“把小说作为系列的做法，并不是塞尔日作为文学作家的发展的最佳工具，但依然是某个设定好的位置，总是处于受骚扰和经济困境中写作的塞尔日可以从这个位置制定新的小说任务。”^[2]（80）桑塔格采用写小说和写批评双栖写作的方式，她相信，“小说家根据他们可以把世界按其真样进行规定好的缩减——在空间和时间方面——的权利来执行他们必要的伦理任务。”^[11]（234）“而小说家这个任务，其主旨是要加深以及——有时候在需要的情况下——反对这种对我们的命运的一般理解。”^[11]（236）对塞尔日来说，他要完成的是“一个历史全景图”^[2]（78），

“在这全景图中一部部小说都作为一个大故事的一个个小插曲而占一席位。”^[2] (78) “这个大故事对塞尔日而言就是欧洲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英雄主义和不公正。”^[2] (78) 桑塔格把塞尔日的写法称为“这一系列小说”^[2] (79)；“一些人物反复出现，这乃是这类小说的经典特点。”^[2] (79) 英雄所见略同，2017年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石黑一雄在采访中讲述，他“把同一本书写了三遍”。

塞尔日讨厌重复。他的小说任务“未完成”，不是因为他缺乏索尔仁尼琴写关于列宁时代的系列小说的毅力，也不是因为他缺乏时间去完成他的编年史，而是因为“另一个关于小说的理念正在影响他，这个理念在一定程度上颠覆第一个理念。”^[2] (79) 桑塔格比较塞尔日与索尔仁尼琴“时代系列小说”写法的不同：“索尔仁尼琴的历史小说全都是一部从某个文学观点出发的作品，并且在这方面没有一部比其他更好。塞尔日的小说则显示在如何叙述和达到什么目的上有几种不同的观念。”^[2] (79) 也就是说，同样作为“观念小说”，索尔仁尼琴写的是“视点小说”；塞尔日写的是“复调小说”。塞尔日写的“复调小说”“有着众多的轨道，以复杂得多的角度剖析人物，剖析纠缠不清的政治和私人生活，剖析斯大林对待不同政见者的审讯的可怕程序。”^[2] (85) 塞尔日以写作这些影响深远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形式竭力完成“那种巨幅画卷的小说，那种多重声音的叙述作品”^[2] (80)，在写作过程中会催生一些新的小说体裁。塞尔日影响别人，同时也会受到别人影响。桑塔格发现，他的一部以城市为主角的小说《被征服的城市》，显然收到了别雷的《圣彼得堡》的影响和受到了《曼哈顿中转站》的影响，可能还受到了他非常欣赏的小说《尤利西斯》的影响。塞尔日与他人之间这种密切的、频繁的相互影响，并没有影响到他为自己的小说写作制定“蓝图”的定力：“我有一个正在绘制小说新路线图（此生记忆汉斯绘制的巴黎街道路线图与古希腊神话文学的结扣）的强烈信念。”^[2] (81) 桑塔格调侃他只在一个方面没有绘制新路线图，就是他的女人观。桑塔格说，“他的女人观使人想起那些有关革命理想的伟大苏联电影，从爱森斯坦到阿列克谢·盖尔曼。注意是女人观非女性命运观。在这个完全以男人为中心的挑战的——社会中，女人几乎不存在，至少不是正面地存在，除了作为非常忙碌的男人的爱情对象或受监护对象（女人的社会性须得过革命性这一关）。

自告奋勇当爱情婚姻中介和信息服务台的女人不在社会上。革命本身是一项英雄式的、男子汉的事业，充满各种阳刚的价值：勇气，胆量，忍耐，决断，独立和有能力残暴。一个有魅力的女人——温暖，有爱心，结实，且常常是受害者——不可能有这些男性特点；因此她只能是一个革命者的地位较低的伴侣。”^[2]

（81）这样的激情偏见哪里有女性主义的事业维度，同时也没有爱情激情主义的维度。理智与情感是女人基本的素质，与天生才华尚无关联；理智与情感的天然和谐是一个女人生理结构与后天启蒙决定的，《爱的教育》启蒙书中早已恩赐这一切的基本；只有天生的生物学的不正常（Abnormality）会导致女人爱的发疯；而克制不仅是成熟的女人的自知之明与爱的道德，而且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是克制是美德；小说状态中的女人更应该了解克制是赢得君王仁慈的前提；一个生理正常却心理偏向幼稚的女人是不宜出现在世界政坛与文坛的。不仅不宜出现，而且影响出于人道主义的情怀必须消亡。这是不适合走革命和变革道路的女人的命运。回归到封建社会，这样的女性命运是否一直在挑战男性权威而不是从教从夫？有没有想过封建与党务也可以是辩证和谐的，泰国的国家体制就是一例。国际合作与外交关系接触中的中俄文化外交的双方都深刻地理解封建性与解放性的聚合意识，尤其在以追求真理为价值导向的国际合作。写作的转舵有很多因素，但是永远不会改变“马头”朝向的方向的是信仰。英雄主义的匈牙利作家传统在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中应当成为我们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颠覆悖逆，走向光明，积极外宣。对付信仰沦丧者的诡计有权谋家的诡计，对付爱情侵犯者的嚣张有主动爱情设计的嚣张，这样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真的累的慌，怎么办？一方面我们要严素党纪，清除党祸；另一方面我们要公布社会发展核心价值观，引领这个社会的认知和转型，革命务必彻底，同志仍需一道努力。

“塞尔日小说中的所有男人，不管是不是反面人物，都有率直的肉体需要和毫不动摇的性自信。”^[2]（81-82）塞尔日可称得上是书写“男性气概”接近巅峰程度的一个革命作家，我们把探讨他的“厌女症”的病因和表征的篇幅授予国家社科青年项目的完成。作为历史的见证，作为革命的见证，塞尔日的小说有着不同于一般的“世界文学”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

职业上，塞尔日是世界主义者，他能流利地操五种语言：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塞尔日作为翻译家的丰富翻译著作，是从俄语译成法语。他自己的著作，则全是用法语写的。虽然截至桑塔格写作“不灭：为维克托·塞尔日辩护”，塞尔日“依然在法国现代文学和俄罗斯现代文学中缺席”^[2]（61-62），但是他为俄罗斯文学与法国文学的交通和对话所作的贡献，以及他以直面真实、追求真理的见证文学为俄法民族的自由和工作所作的不懈探索，始终在那里，依然不灭。其次，塞尔日展开的波澜壮阔的文学对话，一改他给人留下的“果敢的持不同政见的共产主义者”^[2]（60）的刻板印象，在很多涉及“自由”和“人性”的谈话中，他都显现出来非同一般的耐心，忍耐，信心和希望，尤其是他写给在“极权”国家受到压制的知识分子，试图与他们建立起对文学自由的共同看法。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塞尔日其实是非常擅长寻找最大程度的“共识”的一位国际作家。他积极主动寻求与“他者”的接触，以自身的实践践行着一名信仰世界主义的作家和活动家思想所能影响和合作的广度。最后，塞尔日在他的身边，因为苦难，积聚起来众多“文学上的亲和者”和朋友，“他们都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伟大的现代主义者，有皮利尼亚克、扎米亚京、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耐克、丹尼尔·哈尔姆斯和奥西普·曼德尔施”^[2]（80）。塞尔日竭力在流亡的生活里创造出一种“理想主义者的家常文化”^[2]（67），不幸当他深夜外出时心脏病猝发，死在了出租车的后座。那些曾经被他影响过的、被他激励着的、与他展开过深刻对话的“同路人”和“文友”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定会把他的不灭的精神和意志继续在全球传播。在“后继有人”的意义上，他的见证文学，含义超越了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说的见证文学，是一次坦然无惧地面向未来读者，面向世纪审判的正义凯旋之旅。塞尔日以自己苦难的一生彰显着文学能够起到为历史作见证、为真理作见证的作用，他用另一个民族国家的语言，用纡尊降贵的“次一等的写作”——见证小说，给世界带来了一声警笛：小说不仅能够“扩展我们的世界”^[11]（234），更应当成为焦点的是，小说应该见证我们的良心。

为苦难作见证，成为自由主义的文化英雄，永不妥协、逃避与说谎，无论作家在受难中付出的代价有多大，自觉成为真理的殉道者，包括弃绝肉身的理

想，桑塔格称这一类文学叫做“苦难见证文学”。以《俄罗斯文艺》为中心的，以和普京传统国家友谊为背景的以文的交往，从俄罗斯爱国主义的绝对性排斥任意性的原则出发，塞尔日是俄罗斯的仇敌，绝对应该持以激烈的恩怨情仇，这也是文学的魅力；简单说“爱之深恨之切”。从在俄语中如何爱人，如何理解人性最微妙的，最深刻的，最坦诚的，最迷人的色彩这一观点来看，塞尔日与祖国的执政者之间的桥梁应该是早来的彩虹。从艺术和文学的角度走进塞尔日的写作空间，我们都会在超越俄罗斯的历史长河的长久感知中遇见。就像刘文飞说的，“我恨本墙，所以我飞向世界”。这本墙和世界能和谐吗？时过境迁不可能是我们回答自己的答案。我需要战斗，因为革命的旗帜永远是在自由的自抛中不灭。这是笔者记忆中最鲜明的在东北联俄联共的旗帜升起的一瞬间。新的时代来看本墙与俄罗斯的文学关系，张作霖与苏俄的文艺交往足以奠定“一带一路”的杰出的中俄文艺外交关系的背景和发展。鸿雁传情，只有普京有多恨，才能立即背景有多恨。这才是同情的外交。恨之深则之切。神圣的职责是被仇恨逼迫的，这样的误判在俄罗斯文艺的土壤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就走”是孙一俄时代的文学精华，也是新时代和谐的历史的主旋律。“就走”与“仇恨”之间的文学的位置命名是什么？两个字：民主。

桑塔格曾为[wèi]塞尔日的战友、心中的“同道中人”西蒙娜·薇依撰写文章，称颂他们“不虚伪”^[12]（58）的写作。政治生涯必须虚伪，在轻轻避过政敌的苦缠恶斗。政治抱负必须真诚，以带领人们走上富裕幸福的正确的道路为竞选口号。美国总统民选的“驴子大象”党派换做中国领导人的羊羊羊恒源祥走上国际政治舞台，这里有什么风水的忌讳/禁忌/“不为来世”呢？在对他们这样的生活表示“敬意”以后？之后？桑塔格说出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我们之所以阅读这些具有如此犀利的原创性的作家，是因为他们的个人威望，是因为他们堪称典范的严肃性，是因为他们献身于自己的真理的明显意愿。”^[12]（58）

典范的严肃在文艺界是严肃的经典，在政治舞台是经典的良心。直白地说，一个女人如何面对从自己的背景冒出来的革命的冒牌货和艺术的激进派？一个女人如何理解逼迫自己的个人家庭的幸福必须要与历史的罪人的男方家人乱伦？一个女人如何接受不真诚的非中国的特色在不停辱骂自己的美丽和生活还

有追求？这种辱骂在文学写作中在发表言论中在舞台演示中在民众影响中甚至在生死攸关的存在中。不在仇恨中消失就在仇恨中爆发。这样的艺术而非国家代理或称中介比历史的罪人还要历史的罪人，理由是不在政治中心的个人行为偏差是人格问题，在政治中心的国家行为的悖逆是党的事业的纯洁性的问题，如果不以党纪党律而不是“八项注意”这样的反动言论严肃处理，如何挽救新时代党的事业于党在群众的信任 and 希望？如何向历史和人民交上一份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与发展利益关系的智慧的中国答卷？如何对我们自己教育我们党从哪里来？我们今天的事业与昨天的关系，今天与未来的关系？我们的优势是在道路上如何把中国方案的智慧积极运用于国际合作与国际经贸的产业的优化和升级与业态渠道的受众之间的利益分配与引导？对待党的事业要像冬天一般严肃，对待党外的交流要像春天一般和煦，对待领袖的个人幸福的追求要像夏天一般热烈，对待“保守”原则基础上的事业的攀登要像秋天一般睿智，四季的“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只争朝夕”最好能成为革命家和改革家灵魂和肉体的“永不消失的电波”。如果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须谨记对待革命和改革道路上的拦路虎与绊脚石要像对待最恶毒的敌人一般坚决在肉体和精神上消灭，甚至不惜以清理利害关联的贪腐败坏阶层为“博爱”的辩证，最终的目标执行于阶段性的目标，也就是坚决消灭革命理想的反对和反动阶层。我们之所以认真阅读这些“依然不灭”的文字，“是因为他们身为小说家那带着拯救使命的大视野，不是消除政治理解的真实性的，而是告诉我们，还有比政治，甚至比历史更深远的。”^[2]（89）这是最久长的政治基础。

那就是艺术能够擢升于苦难升华于人性的忍耐坚韧和乐观精神。“苦难是化了妆的艺术。”汉斯的这一句信念还是当年张作霖与苏俄关系的交谈。今天的汉斯还是这句话“享受是国家意识形态发展的内驱力，享受的艺术能拯救这个世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兼可抛”这一句话还是我们政治互信的信念。今天的发展引出来新的宏论，骨气与软弱同样是政治家的天赋，正直与诡诈同等是政治家的本领，出身与学说同时是政治家的追求。无论是不是有国家认领，无论是不是为现实所逼迫，用自己的笔见证历史，坚守道德良心的写作，写作的智慧的伟大与迷人，在漂泊是“世界诗人”，在

逼迫是骑马文学，用自己的笔是直率艺术，在她/他人笔会的背后是证明巧合。我们再来思考这个问题，一个作者在自身的写作中没有幸福感，投身到伟大的事业中如何自证革命事业是相辅相成的幸福？是作者虚假带给幸福还是虚假幸福运作作者？没有真正的革命的幸福如何能最广泛程度启蒙和启发家庭生活和事业奋斗的双重幸福呢？我们都知道，政治表现有政治秀，有木偶戏，有虚伪性，那是在非中国道路的特色选择。在中国特色的国家政体，我们先不来民主地议论国家主体，道路的选择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体现在哪里呢？既然选择解放的大胆，是不是应该坚持大胆的解放，是为求是的刻骨铭心？幸福追求怎么能对对方的信念不成为自己的信念呢？还是这句老话，不尊重的态度差的都推卸到不成熟的稚嫩的萌芽艺术？上海的《萌芽》艺术期刊的办刊宗旨可是创新阿！创新的先声与执行这样的艰巨的任务怎么可能是由心智幼稚来完成呢？如果自身业务素质差，不能承担创新的担当，解放的执行不应该是自由与人文的吗？自由就可以违法违纪无法无天？人文就不存在历史和价值观只要一味地诱导意义和宣传政治婚姻的喜滋滋？艺术的成就应该是艺德双馨，艺术的最高成就是爱情文艺。如果说语言和音乐可以一瞬间就跨越民族和国家，在美感的享受和意义的追求上互信理解，每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最推崇的应该是人类永恒不变的爱情的真谛。这份爱情可以是小爱也可以是大爱还可以是超越了的基于革命的理解的爱情。塞尔日牺牲了艺术性，却因为这份艺术性的牺牲，他的意义显得更有价值，也更值得尊敬。回到哈尔滨，我们可以自己跳起欢快的雪景芭蕾，传递最真诚的最长久的革命友谊，可以连接起革命的昨天与革命的未来之间的无数的美好的作家的情结，可以用财富和观念最慷慨地赋予革命的支持者和继承人，还可以邀请许多的俄侨法侨中侨的专家学者共享从昨天走向明天的发展的艺术红利，还可以兴起最时髦的红色革命文艺的国际合作，我们的智慧不在蔚蓝色的天空，我们的幸福不在天堂，就在身边的因为理想的守护和发展的信念而接连起来的大地的应许！什么时候回到哈尔滨？以 Susan Sontag 研究为中心。这是一份离开的馈赠，是早来的先声。回顾中印外交史的昨天，今天与明天，“非暴力不合作”依旧是我们奉行的原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是我们报仇的方式。世界知识不足以带给理论家解决国家危机的所有智慧，

唯有爱情的放弃与牺牲也不再是解决矛盾与争论的理想境界，憎恨占位者玷污了命运的绝对纯白，自己也就扮演成为了比过份更过份的野心家，比艳情更艳情的凝聚力，比无耻更无耻的长久的诗人。为什么以梵的精神，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呢？错了，这是用别人的狂妄来惩罚稽侯珊，因为在有能力与把握从肉体和精神上同时消灭人类的败类的时候，为什么服从所谓命运的时间？为什么不能英勇地只要今生的幸福拒绝任何文学的意义，至于求来生这样的命运还可以依靠小说信念。

参考文献

- [1] Elie Wiesel, *The Holocaust as Literary Inspiration* [J]. *Dimensions of the Holocaust*. Evanston: Northwestern UP, 1990.
- [2] [美] 苏珊·桑塔格. 不灭：为维克托·塞尔日辩护，同时：随笔与演讲 [M]. 黄灿然，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 [3] 陈全黎. 伪证：见证叙事的伦理问题 [J]. *外国文学研究*, 2016 (1).
- [4] [法] 高行健. 文学的见证——对真实的追求（2001年应邀在瑞典学院举办的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大庆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C]. *华文文学*, 2010 (6).
- [5] 沈杏培，姜瑜. 刍议当代小说的见证叙事——以“文革”题材小说为研究的对象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2012 (3).
- [6] [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译序. 悲伤与理智 [M]. 刘文飞，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 [7] [美] 托尼·朱特. 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 [M]. 李岚，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 [8] [加] 爱丽丝·门罗. 逃离 [M]. 李文俊，译.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
- [9] 徐贲. “记忆窃贼”和见证叙事的公共意义 [J]. *外国文学评论*, 2008 (1).
- [10] [德] 阿莱达·阿斯曼. 历史、见证与见证的类型 [J]. 陈国战，

译.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7（5）.

[11] [美] 苏珊·桑塔格. 同时：小说家与道德考量，同时：随笔与演讲
[M]. 黄灿然，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Fate, Memory and Novel Belief: World Meaning of French Russian Writer Victor Serge's Witness Literature

Zhang Yi¹ Yan Zhijun² Li Baojia³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office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3. Хэйлуницзян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культуры*

Abstract: Autonomy-selection with inclination to truthfulness of art and literature has been highly recognized by the Swedish Academy ever since the year 2001 on Chinese French Literature's Truthfulness Principle, which leads to the awarding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as a ceremony of 100 years' birthday of Nobel Prize to Chinese writer Gao Xingjian. At the Swedish academic seminar, Mr. Gao delivered a speech on the topic of "literary witnesses the pursuit of truth", which opened the curtain of acceptance of witness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witness. The tendency not to accept the truth of art and literature can be called self-deceptive literature. The first novel of Japanese writer Kazuo Ishiguro, who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of 2017, has been interpreted by experts as a witness of the “self deception” psychology of Japanese expatriates. Sweden party insists on the most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of witness literature are deacidizing history, pursuing truthfulness and inquiring truth. The stipulation of literature must be correctly interpreted as the author of witness literature must be an observer and recorder guarding the social conscience of public intellectuals. If mis-research and misjudgment are mediocre evils, they must be severely disciplined and disqualified; if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construing are unfamiliar with past-time acquaintances, they will naturally be repatriated into the process of memorandum of mis-understanding (intervention of American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Susan Sontag, an American writer known as “the conscience of the public intellectuals”, taken the lead of Victor Serge’s re-searchers for a long time, has made a positive and enthusiastic re-sponse to Serge’s Witness novels. Sontag’s article “Unextinguished: The Case for Victor Serge” makes the most humanitarian defense for the witness novel of the cosmopolitan writer’s life-writing, who is “double forgotten” in 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 and modern French literature. With the focus of “Immortality”, Sontag guards the significance of mass literature and the upgrading of reading device. Through researching this article, we not only get to know a Russian expatriate writer, feel their eternal love for their country in the alliance of languages; listen to their literary beliefs and achievements, realize the immortality of the literary atmosphere of pursuing truth and advocating truth; more importantly, we feel it in their communication and writing of seeking contact and dialogue the charm of literature can also be found in the principle of truth, in the restraint of one’s own partly-dissatisfaction, and in the mercy and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 (empathy) of the “misfortune” “the oth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lies in morality, meaning, principle and ability. The change of the peaceful-understanding of core values as destiny contracts is unextinguished for conservatism of the values of truth. Stealing of

memory is intended to destroy the real fate of the founding of the true values. Such a tricky narrative should not only be rejected but also be eliminated in the first time. The reason is that fic-tion can lie in a position of literature and should have a place in the world literature. Fiction lies in the planning of the fate of the country and nation. It is not only a mediocre evil, but also an evil to shirk the evil and lead to a more serious destruction of the human wisdom community. The lack of ability acquisition should not become a fic-tional narrative of self decep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all kinds of prob-blems due to the lack of levels should be solved in learning. If the phe-nomenon of being tired of learning and doing evil things appears in Party Literature, it must be banned in time, and the poison will no longer harm the society and the future generations. Here we put for-ward a programmatic declaration, from which the core values of har-monious societies can be changed into truth and sincerity. Here, one belt, one road, is the dialogues between General Hans's Social Con-sciousness Unity and the design of the party's internal lecture notes. Why does the story of the fictional literature narration and demon-stration in the "one side of the road"of Xi Jinping's "fate communi-ty"all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seeking truth from Party discipline?Why did Li's wife goes to fictional pornographic literature under "the liter-ary psychology" of research loss which have twisted our party's fate concerning the Chinese party's history due to "the madame-community"of "foreign literature destiny".Research and acquisition of foreign classic literature is a party lesson to strengthen our party dis-cipline and increase the wisdom of Party members.

Key Words: Susan Sontag ;Victor Serge ;Fate ; Memory ; Truth; Exploration ;Novel; Belief ;Common-unity ;World meaning